

艺海观潮

网络文学的温暖叙事

□ 梁波

近几年,随着网络文学语境的变化和读者审美需求的提升,一大批关注社会现实、充满人文关怀的现实题材作品不断涌现,并推动网络文学逐渐走上精品化、经典化的发展道路。甘肃青年作家王熠的长篇小说《奔腾》便是顺应这一方向的优秀作品。这部小说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夏雨轩一家及周边人物从黄河边的小村庄到现代都市的命运变迁。作品通过对看似平凡琐碎、实则深沉厚重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将普通个体的生命历程熔铸于时代的沧桑巨变中,彰显出鲜明的史诗性追求。

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通常植根于厚重的地域文化沃土。地域文化为文学的史诗性追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底蕴和内在动力。

《奔腾》的故事发生地由河口村延展至兰州城,从村庄到都市,都与黄河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作品中,作为母亲河的黄河不仅是故事的地理空间坐标,更是贯穿整部小说的精神图腾,赋予人物独特的性格和命运底色,并隐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小说开篇以简洁的笔触勾勒出河口村的地理风貌,“黄河水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子,环抱着这个小村庄。从这座山到下一座山,都是树,挤挤挨挨自己就长了起来。河的南岸是大片的麦田,麦田往南是条弯曲弯曲的小溪伴着公路流。”这一场景描写,并非只是单纯的故事背景描写和环境铺垫,而是将自然景观与当地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内在牢牢绑定,是奔腾的黄河、茂密的山林、广阔的麦田共同铸就了河口人坚韧、强悍而又豁达的性格特质。

小说对河口村人们因黄河而生的独特生存方式和生活场景的描写,更是生动地呈现出黄河文化的博大与丰富。特别是李满圈这样的筏子客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黄河起伏的浪头里划水,肌肉鼓胀着,一边划水一边唱着“花儿”,歌声“嘹亮悠远,令闻者落泪”;浪漫之下前路又危机四伏,“驾驭急流而下飘忽不定的羊皮筏子,不光要身强力壮水性好,还需要过人的胆量和智慧”。这种与黄河生死相托、命运与共的生存状态,不仅展现了河口人对自然的敬畏,更造就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顽强求生的生命韧性。此外,深山上山采红菇、水磨坊的轰鸣等场景,都将地域文化的细节融入日常生活叙事,构筑出既真实可

感,又韵味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黄河不仅塑造了河口人的生存方式,更成为他们心灵的寄托和命运的象征。夏雨轩的父亲夏鼎和母亲梁萌,在黄河边的卫生院里救治扶伤,将青春与理想奉献给这片土地;多年后,夏雨轩在黄河边的兰州城开设口腔医院,延续了父母的杏林志业。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生如何起落,奔腾的黄河铸就了他们始终如一的精神品格。小说通过这种植根于黄河的地域生命体验,让个人命运与集体记忆、地方叙事与时代浪潮相互交融,为“黄河史诗”的书写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想象。

传统史诗书写往往与重大社会事件、英雄人物关联在一起,而《奔腾》虽然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但并不追求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目光投向以夏雨轩一家为代表的普通人群,通过对他们平凡人生历程的勾勒,在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中,渗透进对时代发展和生命价值的思考,那就是在大时代之下,普通人应该追求怎样有意义的人生。小说开始的手术场景,便奠定了整部作品于苦难中见坚韧的奋斗基调。听闻丈夫李满圈出事,张丽的手被卷入脱粒机,夏鼎院长在简陋的卫生院里,面对困难的手术,依然全力以赴;而妻子梁萌尽管已有身孕,

却还是配合递手术器械。这场手术不仅是对医者技艺的考验,更是对生命韧性的度量。紧接着,梁萌在为张丽成功手术后突发早产征兆,夏鼎在停电的深夜,独自应对妻子难产。普通生活的日常被演绎得惊心动魄,在一系列的磨砺中,面对职业责任与个人困境的双重压力,夏鼎夫妇展现出的专业与坚守,凸显出一种平凡而伟大的力量。《奔腾》中的人物没有卓越的天赋和传奇的际遇,他们只是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面对命运的幸与不幸,用热忱与坚韧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主人公夏雨轩的成长轨迹,几乎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他的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试错、迂回与挫败。每一个人生节点的变化,都蕴含夏雨轩寻找生活道路、追求人生价值的困惑与拼搏。同样,张丽失去丈夫、手掌残缺,却毅然选择生下儿子李大头并独自抚养;李大头最终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这些人物的命运无不诠释出平凡个体坚持与奋斗的意义,更昭示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从来不会辜负那些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普通人。

文学的史诗性追求,不仅在于时间和空间的叙事拓展,更在于对人性深度进行不懈开掘。《奔腾》在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中,以近乎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国企改革

革等一系列的时代变迁。而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精神深处经历了怎样剧烈的震荡,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坚守与迷失有着怎样的对抗与交织,正是文学必须追问的重要命题。一部作品的价值立场,深刻影响着其可能达到的文学高度。《奔腾》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价值观念,那就是对“善”的坚守与弘扬。在这里,善不仅指向个体的道德选择,更是当代人在时代洪流中如何持守本心、突破困境的力量喻示。夏鼎和梁萌夫妇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乡镇卫生院,在艰苦的条件下救治扶伤,对待患者一视同仁,甚至深夜出诊时“不管有没有驴、骡子或者马,都背着药箱立即出诊,高高的山,长长的山路险峻,就这样一直走,走进山里面去”。这是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更是人性善意的朴素践行,并在多年后由儿子夏雨轩传承下去。夏雨轩开设口腔医院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始终将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凸显出人性的温暖底色。小说对善的坚守与弘扬,源自作者的坚定立场及其对个体生命的深沉悲悯。正如作者在番外中所言:“每个人物背后都站着一个深爱他的作家。”这份“深爱”,并非意味着对人物完美化,而是体现为一种深刻的理解、包容与共情。因此,即使在探视人性幽暗,也没有一味地将人物简单化,而是深入体察其行为背后复杂的社会语境与个体动因,使作品既充满人性的温度,又承载着史诗的厚重感。



兰州黄河之滨 田 蹊

赏析

“与古为新”一语,出自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本是论诗之旨,意在主张从与古人的深度对话中开掘全新艺术境界。移之于当代书法领域,这一理念恰可诠释“守正创新”的内核——先以古为师,潜心追摹,再以古为基,别开生面,最终达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艺术升华。

近日,与古为新——殷望成书法作品邀请展在陇西县博物馆展出,110幅作品集中亮相。

“与古为新”,正是殷望成四十载砚田耕耘的生动注脚。其学书之路,循源溯流:初学颜真卿、柳公权,筑基方正筋骨;继而追慕米芾,领悟爽利灵动;再上溯“二王”,探寻翰墨风雅;复又旁参苏轼、黄庭坚、颜真卿、何绍基、王铎、张旭、怀素等人,博采众长。

对于当代书法实践中“临摹”与“创作”的辩证关系,殷望成有着独到的体悟。他始终坚信,临帖是登堂入室的不二法门。在他看来,真正的书道进阶,当循“由形入神”的路径:“先求其形似,臻于心手相应之境;再参入己意,求其变化,终得与古人精神相契合的妙谛。”然而,真正奠定其书法格调的,是他于碑帖之间走出的融合之路。他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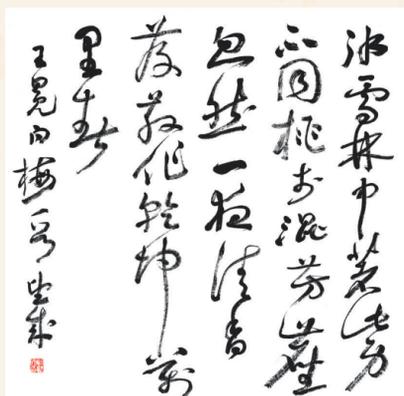
法《张猛龙碑》《石门铭》,又浸润《乙瑛碑》《张迁碑》。帖学的滋养,赋予其行笔的飘逸流转,使转的灵动圆活;碑学的砥砺,则为其线条注入金石般的质感,岁月的沧桑意韵,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笔墨语言。殷望成说:“古人云书法可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性情哀乐,古今之人或有相通;然触发这份性情哀乐的生活质地、视觉经验与心灵节奏,早已天翻地覆。”诚哉斯言,笔下的“新意”是将现代生活的种种震荡与感悟,熔铸于笔端,在手与笔的默契联动中,留下的诚实印记。殷望成常将书法细节,比作文学作品中的精准动词与独特色彩——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能点亮通篇意境,升华作品格调。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根植于他的美学信念。他常说:“细节经得起凝视,作品才经得起时间。”观他

与古为新 笔意双畅

——观殷望成书法作品邀请展随感

□ 何强

的作品,便会在纵横交织的墨线间,发现一个丰富自足的微观世界。这些细节,绝非无关紧要的装饰,而是书家情感与气息最直接的落点。在他看来,书法研习,离不开系统的理论支撑,更需要具备时代性、前瞻性的方向定位;而书家的修养,亦不止于笔墨技法,更需向书外求之——戏曲、文学、哲学、音乐,皆可为书法注入养分。于他而言,书法不是单纯的技艺展示,而是生命经验与审美感悟的凝练升华。线条的质量,既关乎数十年如一日的腕底功夫,更关乎一个人情感的浓度、思想的深度与精神的向度。书法的当代性,究竟何在?答案或许正在于此:它不在于书写了何种时髦的内容,而在于这古老的书写行为本身,如何承载并转化了一位现代人的生命体验。



王冕《白梅》(斗方) 殷望成书

传承

窗棂花格间的民俗画卷

□ 王婷婷 张洪印

木版窗花年画是植根民间的艺术载体。其题材多元,生动记录了传统生活风貌,也展现了中国多元地域文化。各地年画在造型语言、色彩体系与雕刻技艺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北方地区的年画往往造型朴拙夸张,色彩对比强烈,风格粗犷热烈;而南方地区年画则趋于构图精巧,色彩雅致致柔和。

岷县木版窗花年画作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北方年画粗犷热烈的共性中,融合了当地建筑样式、民俗文化与环境的独特印记,形成功能与审美相统一的窗花年画载体。

岷县木版窗花年画的产生,直接源于当地民居独特的小花格窗建筑样式,是一种高度适配特定建筑形制的民间艺术形式。

岷县木版窗花年画与当地民居“虎张口”式小花格窗的结构与功能完美契合。这类窗户通常高约三四尺,呈竖式,从下三分之二处分为两扇,上扇由许多10厘米见方的方格组成,特别适合糊贴窗花,窗花一般都在10厘米见方以内。基于此物理空间,岷县木版窗花年画发展出一套严谨的系统化组件体系,其一为贴于方格内的独立式窗花;其二为贴于窗格最上排,兼具通风采光实用功能的烟眼儿,图案多为“粘轱贯线”或圆形镂空花鸟,常用白纸,体现了功能与装饰的结合;其三则是整套窗花的视觉灵魂——角云。角云为黑色三角形雕版,饰以套八面边纹及花鸟等纹样,多片于窗中心拼合成一个醒目的菱形主景,其深邃的黑色与精妙的刻工构成了整窗的视觉焦点。



岷县木版窗花年画(资料图)

在技艺表现方面,岷县木版窗花年画基于其特定的功能与载体,形成了一套极具地域性的技术体系和艺术风格。其制作工艺虽遵循传统木版年画“绘、刻、印、裱”的基本流程,但在具体实践上却因当地物质条件、建筑需求和审美文化而产生鲜明的本地化特色。

岷县木版窗花年画制作刻版用的材料主要是当地所产梨木。为最大化利用梨木等版材,也形成了岷县木版窗花年画独特的“双面刻版”技艺:在单块木板的正反两面分别雕刻不同的图案。这种“一木两用”的方式表现了民间艺人物尽其用的智慧,使得每一块刻版都承载了双重的艺术信息与经济价值。

与杨柳青、桃花坞等地成熟的多版套色技术不同,岷县木版窗花年画以单版手工上色替代复杂的套色印刷。这是因为其尺幅小巧,精细套版操作难度大、成本高;同时,为了适应窗户采光的实用需求,需要保持纸张一定的通透性,多层厚重颜料叠印会影响透光;而且手工上色可以使作品生动、灵活,更具独特性。匠人们先用单色墨版印出轮廓,随后依据传统口诀和个人理解进行手工填彩,这种“画诀”指导下的自由描绘,使得色彩虽有一定程式,但在色相与明度上充满微妙变化。岷县木版窗花年画的主要工具有刻刀、钢尺、扁铲等,在手法上,线条雕刻追求挺拔刚健、疏密有致,以清晰的阳线或大块留黑来塑造形象,这既能经受住单色印刷的考验,又能在远观时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视觉效果,完美适配从窗外较远距离欣赏的习惯。

岷县木版窗花年画的题材丰富,主要有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历史人物、民俗,以及吉祥寓意图案等。

岷县木版窗花年画题材丰富多样,其核心植根于民间文化,并由此向外延展,形成融合道德教化与审美表达的多层次文化结构。它们并非普通的装饰,而是人们为祈求家宅平安而设置的视觉化载体。大量出现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题材承载着道德教化的功能,而各类吉祥图案以及花鸟草虫等装饰纹样,则直接表达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这些木版窗花年画的张贴时间、地点及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木版窗花年画以高度符号化的方式,集中表达了对长寿、平安等的追求,寄托着农耕时期人们的希冀。

岷县木版窗花年画还与当地历史上的移民文化相关。这种艺术并非简单的技艺移植,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文化融合过程。随着移民的迁入与商品的流通,外来的风俗、审美与技术,为本地文化注入了新的“营养”,在与岷县独特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的长期互动中,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些共性与差异在传承与创新中淬炼合一,共同塑造了岷县木版窗花年画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

荟萃